

记忆与认知：1969年云南盈江特大泥石流灾害研究

耿金¹, 袁静², 张茜²

(1.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91; 2.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1969年云南德宏盈江县弄璋镇南怀河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 档案资料呈现了灾害发生原因、影响及救灾过程。研究人员尝试走入历史发生现场, 以访谈方式让经历者讲述灾难细节, 将灾害历史画面呈现得更为立体。访谈对象在叙述灾害经历时有性别上的明显差异, 女性对灾害记忆的叙述情感更丰富、细节更敏感。在灾后的解释叙述中, 诸多灾后找回的“征兆”在当地流传, 征兆之意义在灾后解释, 并不真正具有预警价值。近些年对灾害遗址物的祭祀表明灾害影响并未过去, 随着祭祀常规化, 当地或许会生成新的灾害信仰体系。

关键词: 泥石流; 灾害记忆; 灾害认知; 祭祀; 云南盈江

中图分类号: D6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20) 02-0036-08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0.02.006

Memories and Cognition: A Study on the Extraordinary Debris Flow in Yingjiang, Yunnan in 1969

GENG Jin¹, YUAN Jing², ZHANG Xi²

(1. Southwest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2. College of History and Archiv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Abstract: A catastrophic debris flow disaster occurred in the Yingjiang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in 1969. The archives show the cause, impact and relief process of the disaster. The researchers tried to walk into the scene of the history and let the experiencer tell the details of the disaster through interviews, which makes the disaster history more three-dimensional. The interviewee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when describing disaster experiences. Women are more sensitive to disaster details and emotional narratives of disaster memories are more abundant. In the post-disaster explanation narrative, many “symptoms” are recovered after the disaster are circulating locally. The meaning of the symptoms is to explain after the disaster, and it does not really have early warning value. The sacrifices to the disaster sites after the disaster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the disaster has not passed. Perhaps a new disaster belief system will be created locally.

Key words: debris flow; disaster memory; disaster cognition; sacrifice; Yingjiang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灾害某种程度上可以专指人类遭受外来侵害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对灾害作用于人类的历史研究大致有两种路径, 即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以历史学为主)。自然科学通过技术手段复原历

史时期灾害烈度、影响范围等; 历史史学以史料文献为基础, 探讨人类社会的应对过程, 偏灾荒史性质。且随着灾害史研究的逐步深入, 学界越来越强调自然科学与史学的综合研究, 从根源上看, 灾害

收稿日期: 2020-03-11

基金项目: 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研究”(17ZDA158); 2019年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双百工程”项目“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丛书”。

作者简介: 耿金(1987—), 男, 云南富源人, 讲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环境史、水利史、农业历史地理研究; 袁静(1998—), 女, 云南东川人, 本科生, 主要从事环境史研习; 张茜(1999—), 女, 陕西咸阳人, 本科生, 主要从事环境史研习。

史具有科学史属性,需要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进行引导判断,也需要扎实的史学功底去梳理资料并做实证分析。^[1]除了这两类群体外,灾害人类学也一直以参与观察方式,呈现灾害发生及救助过程与灾后影响,不过人类学研究的灾害更多是当下才发生的。^[2]而这种走入灾害现场的研究方法也逐渐被历史学者采纳,研究人员尝试走入灾害历史现场(灾害遗址),通过访谈、观察幸存者,最大程度“复原”灾害历史画面,让灾害历史场景变得立体、有温度。2019年1月灾害调研小组在云南德宏开展民族聚居区的灾害应对调研,关注到了1969年德宏盈江县弄璋镇南拱、章金(新老章金)、河边村发生的一次严重泥石流灾害,4个自然村被冲毁,近百人死亡。本次灾害虽才过去五十年,但文本记载仍不多,调研小组在考察期间,曾在盈江县档案馆中找到部分灾害发生经过与救灾过程的档案资料,但档案呈现出来的信息十分扁平化,而灾害发生过程的详细情况,却在与当地老人的访谈中变得越来越立体,在调查采集灾害史料信息过程中,诸多细节也不断呈现。本文在档案文献基础上,以口述访谈方式记录此次特大泥石流灾害经过,既为研究,也为存史。

一、灾害史实的“复原”:基于档案文本的梳理

盈江县属泥石流多发区,山高坡陡,境内最大河流为大盈江,源出腾冲东北叫鸡山,流经腾冲、梁河、盈江三县(市),至缅甸境内汇入伊洛瓦底江。弄璋镇位于盈江县南部,地处大盈江南岸,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大片平坝区属大盈江流域。20世纪90年代编的《盈江县志》记载,从清光绪年间至1990年,全县共暴发破坏性泥石流15次,其中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允线河泥石流、1969年8月1日南怀河泥石流灾害最大。^[3]本次调研的灾害点即为南怀河泥石流区。灾害主要影响现在南永村委会下的3个寨子,分别是南拱、章金、河边;泥石流沟口的南怀、练地村基本不受影响,其中南怀景颇族村有几户人家房屋被冲倒,没有人

员伤亡。章金、南拱都是原先的傣族寨子,河边寨是1964年汉族移民进入后新建的寨子。灾害发生前章金有新寨和老寨两个村子,灾后重建后合为章金。3个村子目前都以傣族、汉族混居,只是河边寨以汉族为主,半山分布有少量景颇族。关于河边寨的历史,据当地的老人回忆:1958年一些傣族搬走了,当地大量土地荒芜,开始有油松岭(盈江县下属乡镇)人在南永种田,但当时只是过来做农活,做完后就回去,那时候认为坝子里病多,汉人待不下,会得病,所以一直没有下山居住。直到1964年、1965年才有大量汉族从油松岭搬迁过来。当时搬迁过来的汉人就住在南怀河边,因此就称河边寨。与原来就有的章金、南拱紧挨着。南拱也有不少汉族,但南拱的汉族来源更复杂,据河边寨汉族老人介绍,南拱的汉族是1957年、1958年才从其他地方搬迁过来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讲“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的来自腾冲,也有的来自油松岭周边。^①

泥石流沟遗址就以3个村子旁边的南怀河为主体。南怀河属大盈江左岸支流,流域面积17.23平方公里,整个流域呈“漏斗状”。泥石流沟呈东高西低,最高海拔为2460米,最低为803米,高差1657米。平均纵坡135‰,主沟长12.25公里,汇流区主沟长7.15公里。^②据当地老人回忆,20世纪60年代南怀河河沟较深,河流周边有大片的水田、旱地。档案记载显示,在灾害发生前,省道以北的水田主要依靠山箐溪水灌溉,而省道以南大盈江江水为灌溉水源:“公路上面至山脚的稻田,全靠山溪箐水灌溉,面积为1737.25箩(《盈江县志》载1箩大概15kg),计有村寨16个,溪箐水因山陡箐短,山区水枯,流量较少,总计也不过0.5立方公尺。”而“山边较大的南黄(怀)河,担负着南怀、(章金)、练地等8个社843箩的灌溉,但水源仍是远远不能解决。”而南怀河虽然承担8个寨子的灌溉水源,但水量只能灌溉6个村寨。^[4]可见,在20世纪60年代南怀河水量也不大。从档案记载和村民回忆,此次泥石流由村寨后山南

^①ZFM,男,65岁(注:至2019年,下同),景颇族,德宏州盈江县弄璋镇南怀村人,访谈人员:耿金、袁静、张茜、李林芳、祁果胖,访谈时间:2019年1月20日。

^②资料由盈江县国土局提供。

怀河堵塞而引起,河水量虽不大,但却造成了十分惨烈的灾害后果。

档案材料可以为我们准确描述灾害发生过程,对灾害造成的直接影响也能较好呈现,如受灾程度、范围、伤亡人数等,而这些材料在访谈过程中,由于村民本身的感受不同,可能会有偏差。1969年8月23日,在灾害发生后二十多天,盈江县革委会对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进行汇总,形成了目前所见记载最为详细的灾害文本材料,为保证准确呈现灾害发生经过,将档案中的核心内容摘录如下:

八月一日凌晨两点零五分,盈江县红心公社红心大队南拱生产队和前卫大队户海生产队东面的弄怀山,山梁分水两侧,从海拔900至1200米的坡面上,发生了崩塌,崩塌面积约1平方公里,崩塌砂石将南怀小河和一碗水小河截断,形成天然水塘。由于崩塌的花岗岩风化砂粒和孤石,透水性强,河底坡度较陡,南怀河当天流量约4~5秒立方米,一碗水小河约1.0秒立方米,土、石、水混合在一起,引起大量的泥石流。山坡倒塌和下泻过程中,发出了巨大的响声。泥石流顺着数公里河谷快速推移,淹没河道深度达20~50米,由南怀山脚、盈江坝边,河道宽浅地形开阔,小河被大量砂石填埋,迫使泥石水流沿山脚呈扇形斜面,往坝子心下泻。两处灾情同时发生,相距4公里。

南拱一带冲刷和淤积长约2.5公里,宽约1.2公里,面积约3平方公里。户海一带冲刷淤积长约0.8公里,宽约0.2公里,面积约0.16平方公里。下泻砂石约150万立方米。稻田内淤积深度0.8~1.5米。

根据老章金贫下中农回忆,在1930年曾出现过较大的山洪,但泥沙很少,只淹了寨内巷道,房屋完整无缺,损失很小。近年来,由于地震频繁,岩石风化加剧。今年五月以来,盈江地区降雨较多,使泥沙极度饱和,失去了稳定性,这是造成在当晚出现特大山洪泥石流的重要原因。

这次山洪灾害,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盈江地区近百年来都没有过。受灾面积约

3.16平方公里,涉及红心公社的红心、红旗、前卫三个大队,17个生产队,20个自然村寨的汉、傣、景颇三种民族,546户,2799人。包括贫农330户,1410人,下中农77户,458人,中农83户,437人,上中农43户245人。插队落户生产知识青年170人,小土地出租1户,6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灾害。还有富农33户188人,地主9户49人。其中红心大队的南拱、新章金、老章金、河边四个村子,全被洪水冲毁,成为1~2米深的一片荒沙。前户大队的户海和南怀两个生产队部分社员的房屋被洪水卷走,计有127户666人,包括贫农82户394人,下中农16户83人,中农15户88人,上中农7户48人,知识青年18人,还有富农3户17人,地主2户11人,(不包括前来这些村做工访友的:腾冲石工6人,陇川2人,县内6人)。

由于山洪暴发在深夜两点多钟,人们已经睡熟,山崩和泥石流下泻时,虽然发出了巨大的响声,但因预料不到山洪暴发,所以,造成了严重的伤亡。计死亡97人:男30人,女67人(劳动力40人),重伤93人(其中知识青年3人),轻伤274人。冲毁房屋246间,冲死水牛64头,马6匹,猪161头;冲毁稻田2100亩,旱地316.6亩;冲走集体粮食13550斤,社员口粮111780斤;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和127户社员的生产、生活用品全被冲走。损失价值:集体部分15万5千余元,社员部分12万4千余元,共计27万9千余元。

在全县军民英勇奋战下,八月一日就将灾区群众全部救了出来,重伤群众分别转移到县城、旧城和0297部队医院,进行治疗,轻伤群众送到红心公社卫生所治疗,对灾区群众的生活及时进行了安排,对死亡的阶级兄弟进行了善后处理。

从八月三日起,由抢险转入抗灾救灾工作,盈江驻军三个部队和全县各机关、公社二十七各单位、两个学习班、一个“学代会”都组织了突击队,大部分单位吃住工地,经过15天的艰苦奋战,搬掉了山洪冲来的大树,筑起了被泥沙冲毁或淹没的田埂,改修河道,

在下陷至腰的泥沙层上重新栽插水稻60亩,每天平均投入战斗2000人,投入运输的大小汽车39辆,计抢险救灾投入3万工日。^[5]

这是目前所能见到对此次灾害事件最完整的官方记录,将此文本摘录,既能真实呈现灾害史实,也能为此次灾害事件保存史料。以上记录对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成灾原因及救灾过程的呈现都较为清晰,特别是关于此次灾害发生原因的解析,主要是后山发生山体坍塌而出现河道堵塞。在本地的走访中,村民称周边村子有人在灾害发生前听到巨大响声,应该就是山体坍塌造成的。档案中呈现的灾民伤亡数值也十分准确,但冰冷的数字却并不能完全呈现灾害带给灾民的创伤之痛,每个数字背后都有与灾害相关的个体感知,也需要在灾害史研究中给予关注。下文将就走访中的访谈内容,将此次灾害事件细节尽量“复原”。

二、灾害记忆中的性别差异

灾害具有暴力性、突发性和破坏性,灾害一般是一时性的,但由灾害受到的强烈损伤作为一种印象记忆会长期地残存在人们脑海里。^[6]因此,灾难虽已过去五十年,幸存者仍能对灾害过程有深刻记忆。访谈的灾害经历者年龄基本在70岁左右,从老人们回忆内容与表达情况看,性别在灾害记忆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别,男性老人对灾害细节的记忆不如女性老人,前者的回忆更多在陈述灾害发生前后的现象解释上。从灾害对人心理影响角度而言,灾难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是普遍的,但程度却因人而异,有的通过自身的调整,很快恢复到健康状态;而有的却可能从此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下。从性别上看,男女对灾害的承受度及记忆情况也有差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女性比较感性,她们会将自己的情绪融到灾害记忆与讲述中,并将切身之痛以恰当的方式发泄和表现出来,对灾害发生情景的描述,会伴着丰富的语言和肢体动作;而男性较为理性,叙述中表现得相对淡然,个人情感在外来者面前大多被隐藏起来。

从章金嫁到练地村的LXA老人,灾害发生时

有13岁,“我是章金的姑娘,嫁来这边。当时才13岁,很害怕,水来把大门都淌走了,猪跑出来,羊也跑出来,我跑出来就被淌了,大家都被水淌了,我妈他们在后面。我当时就想着‘死了死了’。”“冲出来之后,我们爬到了房子上坐着,后面淌到大埂子(注:田埂)那儿,被一个五保户救起来。”泥石流从后山冲下,首先冲击的就是南拱,因在泥石流中腰部受伤,耽搁医治,导致老人现在仍不能用力,使不上劲儿。不过很庆幸,家人没有在此次灾害中遇难,但灾害却在她自己心里留下极大阴影,对水灾、暴雨甚至是普通降雨都有惧怕,而且对声音也格外地敏感:

有一年的雨季,那几天一直下着雨,特别是有一夜雨十分的大,后山也发出很奇怪的声音。吓得我赶忙往外跑,过了一久(会)才发现并不是发洪水,只是风吹响了树叶,这才胆战心惊地回到家。^①

在LXA老人的回忆中,呈现出了诸多灾难发生细节,“我们章金人死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大洼地,以前叫水地,有两三米深,被从山上冲下来的泥沙淤平了。”这次泥石流暴发,先是清水冲入村子,随后是带泥的浑水,之后才是泥沙、石头,这中间有一段时间间隔,老人们也能很清楚地将这种细节表达出来,“清水来的时候,啪啪啪地来,(声音)越来越大,(水位)越来越深,但江水来的时候很平稳。泥沙来的时候一处都去不了,陷在里面就出不来。害怕死了,现在想起来身体都是散的。(被泥石流冲走后)嘴里、头发里全是泥沙,耳朵里全是,听不见声音。”泥石流发生时,清水先冲进村子,之后是泥水,再后为泥沙、石头,中间间隔据老人称大概有三四分钟,如此短暂的间隔,老人们却终生难忘。也正因有短暂时间差,一些人才存活下来,“先来的水很大,来的时候老人吹哨子,清水来了,我就被淌走了,我妈他们在后面。”这种细节的描述,为我们了解灾害过程提供了细致材料。

GXG老人也是章金人,灾后嫁到旁边的练地村,不幸的是她有多位亲人在此次灾难中丧生。在

^①LXA,女,64岁,傣族,德宏州盈江县弄璋镇南永村委会练地村人,访谈人员:耿金、袁静、张茜、李林芳、祁果胖,访谈时间:2019年1月19日。

讲述她及家人的经历时，几度落泪，泥石流灾害给她带来的创伤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淡化。她描述灾害时说：

大水来了之后，姐姐和我就赶忙跑出去，出来后看到一个大石头，我们一家人爬到石头上站着避灾。突然“噙”的一声，大水把石头冲走了，我们一家人全部被一冲而散了，一阵烂泥袭来把姐姐捂死了，姐姐就这样在我的眼下消失了。等到天亮，我看见她的一只脚，过去摸了一下，才敢相信姐姐真的死了。我们家死了5个人。^①

回忆起灾难时刻，访谈者仍能清楚记住当时的每个细节，泥石流的行进路线也在老人的描述中呈现出来：“南拱先淌走，再到我们寨子（章金），再到河边寨。半夜三更的，当时水冲下来，水里的石头擦到了我的腿脚就出血了，跟着就有很大蚂蟥叮了我的脚，脚抬起来肿得很大。天亮了看到大个大的蚂蟥沾满了脚在吸我的血，现在一看见蚂蟥就害怕得不行。”蚂蟥叮咬之痛完全是个体经历，这种个体感受，基本不会出现在宏观性的灾害总结报告中的，因此档案类的文献中也就不会记载。

泥石流带来的恐惧心理似乎在女性身上表现得更为持久，河边村的ZJS老人也提及灾后对降雨的敏感：“我家有一个娃娃才半岁，娃娃也被冲走了，我和娃娃冲下去之后就在那个塘子里躺着，我家男人听见我们在塘子里哭，就先把我们拉起来坐着，然后又把娃娃抱起来坐着。还好娃娃还活着，他爸爸在那里抱着他，不动的话他就安静地睡着，轻轻地一动，他就哭了。现在一看到下大雨心里就急了，就有感觉了。”女性记忆中，明显表现出围绕自己最为关心的人展开，有关孩子的记忆就变得十分准确，被救的过程也能清晰呈现出来：“后面（部队）官兵就来救我们了，他们的脚踩了一处，我就跟着他们踩，慢慢地踩

着出去，用杵棍杵着出去的。当时下着雨，来到了路上，实在走不了了，他们又端（拿）了一个高高的凳子给我坐，之后又让我坐在一个口袋上，我一坐下去就起不来，等医院的车来拉伤员去旧城，我就去不了了，起不来。我是被他们抱去车上的，拉到旧城之后就什么都晓不得了。”^②女性在描述灾害过程中的细节呈现，即使已过去五十年仍如刚刚发生一般，陈述中细腻的情感一并得到表达。

相比于女性老人在叙述灾害经历时的声情并茂，大多男性老人表现更为平淡，对灾害事件的细节也相对“粗糙”，但有特殊工作经历的男性老人在灾害细节描述上也十分具体。章金寨LZR老人在叙述灾害发生后的救助时，对每个村死亡人数、政府发放的救济粮数量十分具体，对数字极为敏感，随着访谈的深入才知灾害发生期间老人曾担任村里会计：“章金寨在很久以前就分为两个寨子：上寨和下寨，于1963年初从油松岭搬下来，当时上寨有13户、70多人，下寨有14家，汉族很少，有四五家。我家死了两个，我姐和我妹死了。”家里有亲人在泥石流中丧生，但在叙述中却表现得十分平淡。“灾后20天左右，谷子还没有收成，所以国家供应3个月的粮食，一人一件新衣服，一家5口人以上两套被子，5人以下一套被子、一块毛毯。人家捐的旧衣服一人给了一套，新的给了一套，旧的一套。”^③作为村干部的LZR老人对当天泥石流发生经过的记忆其实也是比较准确的，只是描述中像是在讲故事，情感在面对外来访谈者似乎也被隐藏了起来：“当时是两点左右，声音像飞机一样‘呜呜呜’的，一个小时都没有泥石流就来了，那些树从山上被冲下来，我们还去捞柴。那晚是农历的六月十八，当时月亮很白，捞完柴过了一会水就冲来了，墙被水冲倒了，我被冲到了牛圈里面，我就把牛圈打开，把牛放了，牛还没有出来我

^①GXG，女，67岁，傣族，德宏州盈江县弄璋镇南永村委会练地村人，访谈人员：耿金、袁静、张茜、李林芳、祁果胖，访谈时间：2019年1月19日。

^②ZJS，女，76岁，汉族，德宏州盈江县弄璋镇南永村委会河边村人，访谈人员：耿金、袁静、张茜、李林芳、祁果胖，访谈时间：2019年1月19日。

^③LZR，男，70岁，德宏州盈江县弄璋镇南永村委会章金寨人，访谈人员：耿金、袁静、张茜、李林芳、祁果胖，访谈时间：2019年1月19日。

就被淌走了,牛随之也被淌走了,我淌到了从南拱过来的小路上的树旁边,第二天我就在那里看到南拱还有几家房子没倒。天亮以后就去到了弄相(注:属弄璋镇),之后又去到了医院。”对灾害过程的描述虽然也较为具体,但在救助过程的表述上却十分平淡。河边村的FDP老人也讲到当时泥石流冲下来的大树特别多,“(大树)都被冲下来,这一片都是柴,柴火相当多,以前都不用电,捡了来烧,烧了四五年。”^①访谈对象越来越多的细节讲述,让灾害过程变得更为立体。

从上文访谈效果看,女性老人的回忆与陈述在细节上更为丰富,也包含着个人诸多情感,灾害影响的立体感在老人们的叙述中也逐步显现出来;男性老人的叙述内容更多与解释灾害有关,包括灾前的所谓“征兆”及灾后的民众行为。

三、灾害认知中的解释体系:征兆与信仰

考察访谈期间,当地流传两则可称为灾前“征兆”的说法:其一是当地老人有这样的认知,本地泥石流暴发是有时间周期的,即“三十年一小发,六十年一大发”;其二是在泥石流暴发前有一老人曾到当地劝说本地人搬走,却没人理会。这两种说法是否真在灾前存在过,无法考辨,但许多经历了泥石流的老人都会以此来介绍此次灾害。这种认知是在灾害发生后,民众基于对灾害发生的溯源性回应。

河边村的男性老人CZQ在访谈中说:“有一个老辈人传下来的说法,(泥石流)‘三十一小发,六十一大发’。”^②对历史上当地泥石流发生史梳理,距离1969年最近的一次是1930年,再往前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往后2004年南怀河也发过一次大水,不过不是泥石流,对周边村子影响也不大。如此推算,30年、60年的周期说似乎

有些根据,只是这种说法无法考究其科学性,属于地方在应对灾害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总结,乃地方乡土知识,可纳入灾害文化范畴。

灾害发生前,老人发出预警,也多是灾后幸存者的记忆拼接与附会。CZQ老人说:“有一位老人(当时80岁)说这个地方不能住人,以后会被洪水冲走,但当时房子才盖起来村民们不想搬走,所以也就没有搬离这个地方。一些人认为他在说坏话,把他赶出寨子,不准在寨子住。结果他离开的三个多月后泥石流暴发,寨子就被淹没了。”在另一位被访者的口中,这位老人再被提及,不过却已被神化:“其他寨子的人说‘河边寨来了一个仙人’,他家在油松岭,当时来这边看亲戚,就和大家说‘过几年河水就要泛了,你们赶紧搬搬,不要在这里住了’。但一些人说这个老祖‘扇阴风点鬼火’,后来这个老人就回去了,之后三个多月河水就泛了。一年多后他就去世了。”^③这个神秘的老人在练地村的访谈中又被提到,练地村与南怀村以南怀河为界,分列河道两岸,在此次泥石流灾害中除村里部分农田被冲毁外,村子没有受影响。村中SFN老人说:“有一家房子没有倒,前一天晚上有一个人去敲他家门,告诉他家第二天夜里要犯洪水,这家人给他饭吃。泥石流发生时全村的房子都倒了,只有他家那间没倒。我们这里传说那个是神,其他人都不相信,唯独这家相信他的话,所以这家没有淹。”^④南怀村是景颇族村子,1968年才完全从山上搬下来,搬来的第二年就发生了泥石流。村民ZFM当时在镇上中学读书,当天晚上留宿在校,第二天一早学校通知放假,老师组织学生到灾区救灾,才回到村子,“学生、部队都来,我就回来看看我们家,我们家冲不到,那些比我大的就参加抢救工作。”进村就看到光秃秃、白茫茫的一大片,自家村子旁边的几个村子已经不见了。在

^①FDP,男,65岁,德宏州盈江县弄璋镇南永村委会河边村人,访谈人员:耿金、袁静、张茜、李林芳、祁果胖,访谈时间:2019年1月19日。

^②CZQ,男,65岁,汉族,德宏州盈江县弄璋镇南永村委会河边村人,访谈人员:耿金、袁静、张茜、李林芳、祁果胖,访谈时间:2019年1月19日。

^③FDP,男,65岁,汉族,德宏州盈江县弄璋镇南永村委会河边村人,访谈人员:耿金、袁静、张茜、李林芳、祁果胖,访谈时间:2019年1月19日。

^④SFN,男,77岁,汉族,德宏州盈江县弄璋镇练地村人,访谈人员:耿金、袁静、张茜、李林芳、祁果胖,访谈时间:2019年1月20日。

说到灾前征兆时,也提到了来河边村走亲戚的老人:“还有一个老人来河边寨串门,结果那家的房子被冲了但还剩一半,其他家都被冲走了,是不是真的来串门也不知道,所以老人才出去一会泥石流就下来的,这个老人不在了,是外地人。”^① 相比于河边村老人们的叙述,ZFM的叙述显得较为平实,这或许才是最接近真实的情况,而在灾害叙述中,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将老人不断神秘化。这种灾后回找的“征兆”多半是本地人在事后叙述过程中逐渐添加形成的,但也并非全无根据,老人串亲戚的人家房子未倒,或许就成为故事叙述源头。作为研究者,其实并不在乎解释故事是否完全真实,更应关注故事产生的内在逻辑。

传统时期,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在村寨里都有各自信奉的神灵,汉族会在村寨里立有土地庙,专管一方平安;而傣族则有两套神灵系统,一种是以供奉佛教神灵的奘房祭拜场,一种则是以祭拜寨神为核心而形成的祭祀地。以章金为例,村子里在“文革”前就有奘房,但“文革”期间被当作“四旧”拆掉了,现在的奘房是2011年才建的,由政府出资,当地民众出力,奘房里供奉观音像。除奘房外,傣族还有寨神庙。汉族也建有土地庙,供奉的是土地公,傣族的寨神庙里没有神像,“汉族是土地公公的像,傣族没有什么,摆几个石头就可以了。”“拜的时候点一个蜡烛,烧烧香,没有神像,不像汉族庙有神像。”^② 1969年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村寨里没有傣族的奘房,汉族也没有土地庙,傣族与汉族都没有形成灾害的各自民族文化解释。当时应对灾害被视人类与自然搏斗、并最终战胜自然的表现,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5]的号召下,个体的声音被忽视了,地方信仰所具有的抚平灾难创伤的作用也就无法发挥。

在调研小组走访期间,发现人们并未淡化灾难,而是通过另外的方式在表达哀思、祈求平安,村民们开始在泥石流沟口祭拜从山上冲下来的“巨石”。此次泥石流本质上是由滑坡堵塞河道导

致的。老人们回忆,泥石流发生时,先是清水冲进村子,之后是泥沙,最后才是大树、大石头。泥石流冲下来的石头大小不一,最大的有上百吨,本地人称比房子还大。调研小组在灾害遗址区走访也见到了六块巨石矗立在泥石流沟口:南怀河上游沿河道两岸各有一块,两块巨石长宽高都在6~7m以上,石头呈青黑色;在这两块巨石下游400~500m处沿河靠南怀村一边还并排矗立着三块巨石,体量比上游两块略小,石身一部分在河道里,一部分高出河道两岸耕地2~3m,估计高度也在5m以上;南怀村村口下方5m处还有一块巨石,当地人称“雷打石”,因石头像被雷打过、整齐断开分成两半而得名,其实是在泥石流冲击过程中,石头互相撞击破开而形成的,所见石头也大概在4~5m高,但只有一块。据章金LZR介绍,在河流上游的两块巨石之间先前还有一块体积差不多大的巨石,只是由于石头矗立于河道中间,前些年被县水利部门用炸药爆破后用作兴修水利工程石料了。当地村民,特别是南拱、章金的村民见当年泥石流冲下来的巨石被爆破搬走,极力反对,认为河道沿岸的巨石不仅是此次灾害的历史见证,而且巨石也是下游村寨的守护屏障,能保障下游村寨生命财产安全。南怀村村民ZFM称,章金、南拱的村民近些年会在河道中对着巨石处进行祭拜。泥石流沟口的两块巨石分河流两岸,面对而立,但村民只是祭祀靠南怀村一边的石头,主要是祈祷来年能风调雨顺,不要再发大水。祭拜时会杀猪、羊,并由村里的老人主持祭祀仪式。可见,1969年的灾害与巨石绑定在了一起,这种祭祀行为才开始不久,如果能成为当地常规祭祀活动,灾害事件就会真正变成“故事”而进入民众生活,只要祭祀活动能一直持续,故事就会一直存活,或许未来还会形成本地特有的灾害信仰体系,生成具有区域特性的灾害文化。当然,记住灾难并不是要保留伤痛,而只是为那些逝去者和幸存者保留灾难印迹,至少不会因时间流逝而好像从未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的书写也

①ZFM,男,65岁,景颇族,德宏州盈江县弄璋镇南怀村人,访谈人员:耿金、袁静、张茜、李林芳、祁果胖,访谈时间:2019年1月20日。

②LZR,男,70岁,德宏州盈江县弄璋镇南永村委会章金寨人,访谈人员:耿金、袁静、张茜、李林芳、祁果胖,访谈时间:2019年1月19日。

有此价值。

四、余论

目前历史学开展灾害史研究更多是依靠保存下来的史料,德宏盈江弄璋镇1969年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保存下来的史料除当时记录灾情的档案外,文本资料不多。而当年的泥石流遗址仍在当地存留,而且百姓在泥石流堆积层上新建家园,开垦了土地,每天劳作于灾害现场,经过多年伤痛沉淀,幸存者愿意将灾害过程诉之于他人,也希望更多人知道曾经的灾难历史,害怕随着经历者的逐渐逝去,遗址背后的故事也一并淹没在泥沙之下。在这种心态驱使下,灾区的访谈经过就极为顺畅。作为外来者,调研人员多以猎奇心态进入灾害遗址,随着访谈深入,灾区历史感逐步形成,研究人员原先的预设与构想也渐渐放弃,在“复原”灾害历史过程中,研究者主动将话语表达的主体让位给受访者,让经历那段历史的个体表达属于他们自己的灾害感知,这才是最有意义和价值的,过多修饰、加工与阐释,都可能会使历史本来面貌变得更为模糊。

档案文献与现场访谈都是为最大程度地复原灾害历史画面,当然,访谈对象的主观感受不同,呈现出来的灾害色彩也会有所偏差,但这是面对灾害个体本该有的正常反应。发掘、纪录灾害历史,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保存灾害“影像”,这种文字的影像既能通过叙述者的语言描述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同时也能给历史现场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间。

[参考文献]

- [1] 卜凤贤. 灾害史研究的自然回归及其学科转向 [J]. 河北学刊, 2019, 39 (6): 73-79.
- [2] 李永祥. 论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J]. 民族研究, 2013 (5): 55-64.
- [3] 盈江志编纂委员会, 编. 盈江志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69.
- [4] 盈江县农业局. 弄璋区弄永乡当前灌溉情况及今后意见 [A]. 盈江县档案馆藏, 档案号: 56-1-2.
- [5] 盈江县革委会. 盈江县防洪抢险救灾指挥部总结 (初稿) [A]. 盈江县档案馆藏, 档案号: 22-1-1.
- [6] 樱井龙彦, 虞萍, 赵彦民. 灾害的民俗表象: 从“记忆”到“记录”再到“表现” [J]. 文化遗产, 2008 (3): 76-87.

